

中国现当代文学学人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第二代学人的 个像与群像

——以《蒋心焕志》为中心的讨论

鲍国华

摘要：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第二代学人，与第一代和第三代相比，似乎面貌有些模糊不清。在后世研究者眼中，第二代学人往往以群像的方式存在，而其个像则常常被忽视。事实上，第二代学人既与第一代学人共同建立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又与第三代学人共同实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繁荣，其个像与群像均至为鲜明。《蒋心焕志》一书，以独特的体例，塑造了以蒋心焕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第二代学人的个像与群像。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第二代学人；个像；群像；《蒋心焕志》

迄今为止，中国现代文学学科^①第一代学人的历史地位和贡献，已经得到较为清晰的梳理和确认。这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必须充分且客观地估价既往的成就和不足，才能为今后的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第一代学人均已去世；第二代学人部分健在，但由于年龄原因，已不再从事学术研究；第三代学人也基本上告别了学术舞台，但仍有笔耕不辍者，继续为学科做出实质性的贡献。在这三代学人中，相对而言第一代和第三代更受关注。第一代学人作为学科的开创者，如日中天，受到重视自是题中应有之义。第三代学人，于“文革”结束后的新时期进入学界，亲历并参与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作为“显

学”的辉煌历史，也极受关注。相比之下，第二代学人的面貌则有些模糊不清。在后世研究者眼中，第二代学人往往以群像的方式存在，但其个像则常常被忽视。事实上，第二代学人既与第一代共同建立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又与第三代

^① 在高校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体系中，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与文艺学、中国古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并列的二级学科，但本文主要考察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的学科及学人，彼时学科名称尚为“中国新文学”或“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兴起并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方向之一，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因此本文使用“中国现代文学”这一学科命名方式。

学人共同实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繁荣,其个像与群像均至为鲜明。第二代学人的突出之处,恰恰在于个像与群像之间的巨大张力。本文从这一视角出发,考察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第二代学人的地位和贡献,并以魏建、李宗刚等著《蒋心焕志——一个师范人及一代人的历史》一书为中心,探索准确理解并有效呈现第二代学人个像与群像的思路和方法。

一

温儒敏曾这样描述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第二代学人:“这一代学人有些共同的特点,是其他世代所没有的。他们求学的青春年代,经历了频繁的政治运动,生活艰难而动荡,命运把他们抛到严酷的时代大潮中,他们身上的‘学院气’和‘贵族气’少一些,使命感却很强,是比较富于理想的一代,又是贴近现实关注社会的一代。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从一开始就支撑着他们的治学,他们的文章一般不拘泥,较大气,善于从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提炼问题,把握文学的精神现象与时代内涵,给予明快的论说。90 年代之后他们纷纷反思自己的理路,方法上不无变通,每个人形成不同的风格,但过去积淀下来的那种明快、大气与贴近现实的特点,还是保留与贯通在许多人的文章中。”^①这一论述颇为贴切。较之第一代和第三代学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第二代学人有其特殊性。第一代学人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绝大多数都是半路出家,他们之中有作家(如许杰、陈白尘、田仲济、唐弢等),有古典文学研究者(如任访秋、单演义、王瑶等),这使他们具有丰富的学术经验和较强的学术个性,但也面临转型的困惑和痛苦。而第二代学人是在学科建立的过程中实现自家的学术训练的,从一开始就具有较为明确且坚定的学科意识。对他们而言,学科建设与自家成长,存在同步性和共生性。作为新中国文教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既是第二代学人的专业和职业,又是其事业和志业。因此,第二代学人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忠诚度强,意志坚定。从事这一学科,可能是自主选择,也可能是组织安排,但一经确

定,便将自家的理想和信念植入其中,也由此逐渐铸就了自家的人格。同时,20 世纪的上半期,皆为大时代,各类大事件、大人物层出不穷。第二代学人受教于下半期,却以上半期为研究对象,是经历过下半期的时代风雨、并努力书写上半期的时代风雨的一代。这使他们在学养之外,还有着坚毅果敢的生命韧性和深沉质朴的学术人格,而后者更能体现出这一代学人的特色和取向。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由第一代学人,如李何林、唐弢、王瑶等奠定,^②然而这一学科的真正建立,实有赖于第一、二代学人的合力。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来的新学科,中国现代文学在高校学科体系中的确立,既源于第一代学人的筚路蓝缕,也源于在前辈感召和自家理想的驱动下,投身于学科的第二代学人的坚守和传承。学科的拓荒与深耕,实由这两代学人共同完成。第三代学人从 1977 年恢复高考(包括研究生招考)开始走上学术舞台,十余年的人才积压使这一代人年龄相差较大,精神面目各异,彼此间的个性大于共性。第三代学人虽然形成了一个杰出的学术共同体,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大放异彩,但不以内在的同一性为追求,也不以群体的面貌呈现于学科史和学术史。这与第二代学人有着显著的不同。不过,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成为显学,并非第三代学人独立完成。事实上,第二代学人从事教学与研究,跨越 20 世纪 50 至 90 年代,甚至延续到 21 世纪初。他们的学术代表作,也大多完成于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其中固然有数十年

① 温儒敏:《序言》,冯济平编:《第二代中国现代文学学者自述》,第 2 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

② 李何林、唐弢、王瑶曾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三大奠基人”。蒙李浴洋指出,“三大奠基人”之说并非一以贯之,而是近年来才渐渐出现。事实上,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第一代学人远不止于此,至少还应包括早期为学科建立做出重要贡献的蔡仪、丁易、张毕来,以及长期任教于地方高校的田仲济、陈白尘、陈瘦竹、任访秋、单演义、刘绶松、孙昌熙、贾植芳、吴宏聪、钱谷融、俞元桂等(以上均按照生年为序)。李何林、唐弢、王瑶之所以并称且得到广泛赞誉,恐怕是作为 1981 年 11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首批博士生导师,且任教于北京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独特身份使然。

的学科实践和经验积累,也源于他们在“文革”结束后的新时期,锐意进取,争分夺秒地挽回失去的时间和机遇,焕发了学术生涯的第二春。这样看来,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辉煌,是由第二、三代学人共同努力下实现的(当然也包括第一代学人的贡献)。与第一代和第三代学者相比,第二代学人的学术修养和知识结构可能不是最合理与完善的,但在承前启后的同时,第二代学人在学术与人生之间建立紧密的关联。他们大多经历坎坷且丰富,却因经世而知世,因知世而论人。对他们而言,学术与人生、历史与现实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在特殊时期,第二代学人的研究可能遭到禁锢,但仍坚持教学;教学也可能被终止,但仍不放弃思考。他们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有意识地通过教学与研究,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保存了火种,并由此获得了自家参与现实、对话当下的意识和能力。这一选择,铸就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与生俱来的动态性和现实感,使之不容易被绝对地历史化和经典化,也确立了第二代学人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上不可替代的独特地位。

2011年,《第二代中国现代文学学者自述》一书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了30位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第二代学人的自述,包括邵伯周、王景山、孙中田、彭定安、许怀中、陆耀东、曾华鹏、林非、朱正、陈鸣树、乐黛云、范伯群、田本相、吴小美、严家炎、魏绍馨、朱德发、许志英、刘增杰、黄侯兴、冯光廉、孙玉石、黄修己、易竹贤、黄曼君、骆寒超、董健、陈美兰、洪子诚、吕进。他们是第二代学人中的佼佼者,其学术成果代表着一定时期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最高成就。不过,该著对以上30位学人的考察,更多的还是对学人个像的强调,意在凸显其学术个性,而非整体性的代际特征。而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第二代学人之共性和群像,以及个性与共性、个像与群像之间的张力,反而是从后文将要论述的学术成就貌似不甚突出的蒋心焕,以及《蒋心焕志》一书中,更能得到有效的阐释。

二

如前文所述,第二代学人的面貌,相对而言

呈现为齐整的群像,其个像往往隐而不彰,远不及第一代和第三代学人突出。这与第二代学人承担的学科使命密切相关。在第一代学人为学科开疆拓土的基础上,第二代学人的使命是通过教学与研究,使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真正落到实处。因此,对教学的投入,对学术薪火相传的重视,是这一代学人的共同选择。甚至在许多学人看来,教学的意义重于研究。这在师范院校任教的学人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第二代学人的一大共性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高度关注。这与他们多为高校教师,借助文学史教学在高校教学体系中逐步确立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地位密切相关。在教学的同时,第二代学人或多或少都主持或参与过各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撰写。这类集体编写的文学史,尽管部分地实现了术有专攻,各章节执笔人的遴选,尽量根据学人的兴趣和专长,但更强调立场、观点和体例的整齐划一,而相对避免突出每位研究者的学术个性。特别是作为教材的文学史,全面、平实、稳健是其追求,也造成其难以克服的局限性。第二代学人尽管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各有所长,但在教材编写过程中,其学术个性不仅难以彰显,甚至还要刻意压抑。据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第二代学人的杰出代表严家炎回忆:

早在1962年,唐弢先生组织我们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时,我就利用一次休息的机会,向当时与会的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提了一个问题:“黄遵宪1887年定稿的《日本国志·学术志》中,已经提出了‘言文一致’、倡导‘俗语’(白话)的主张,这跟胡适三十年后的主张是一样的,我们的文学史可不可以直接从黄遵宪这里讲起呢?”林默涵摇摇头,回答得很干脆:“不合适。中国现代文学史必须从‘五四’讲起,因为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已经划了界线:‘五四’以前是旧民主主义,‘五四’以后才是新民主主义。黄遵宪那些‘言文一致’的主张,你在文学史《绪论》里简单回溯一下就可以了。”我当然只能遵照林默涵的指示去做,这就是“文革”结束后到1979年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

国现代文学史·绪论》里的写法。^①

严家炎的思路,直到近半个世纪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才得以落实。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从“五四”抑或晚清开始,见仁见智,是学术观点的分歧。但林默涵的回答,显然基于政治而非学术立场。强调立场、思路和方法的整齐划一,是集体编写教材的必然追求。第二代学人主持或参与教材编写的经历,使其学术个性不易凸显,以群像的面貌出现于学科史,成为这一群体的重要标签。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第二代学人的另一共性是对鲁迅的注重和推崇。尽管不是每一位学人都以鲁迅研究见长,但鲁迅在其现代文学教学与研究,以及现代文学史建构过程中的支点作用,体现得至为明显。对第二代学人而言,鲁迅和鲁迅研究具有特殊意义。首先,鲁迅思想与文学的卓越成就和巨大影响力,使其具有广阔的阐释空间,可以使研究者的学术素养和潜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其次,在特殊时期,鲁迅是唯一获准公开阅读、教学与研究的中国现代作家,成为研究者可以倚仗的为数不多的思想文化资源,尽管这一资源也时时遭遇政治的删减、压制和禁锢。基于此,第二代学人的学术观点,只有借助对鲁迅及其作品的阐释,才能获得较为充分的学理性或公认的合法性。以鲁迅和鲁迅研究作为支点,在第二代学人中大体形成了共识。即使是不以鲁迅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学者,也同样具有这一共识。第二代学人的鲁迅研究,虽然未必能够代表自家学术的最高成就,却成为这一群体的研究立场、思路和方法的突出例证和真实写照。与此同时,对鲁迅的教学与研究,又能够彰显第二代学人的学术个性。虽然在特殊时期,学术个性往往遭到压抑,处于沉潜状态,但对鲁迅的注重和推崇,以及对鲁迅予以深度阐释的学术追求,锻炼了第二代学人的能力,提升了他们的素养。在“文革”结束后的新时期,随着思想文化环境的逐渐宽松,第二代学人的鲁迅研究迎来了一个爆发期。王景山《鲁迅书信考释》、林非《鲁迅前期思想发展史略》、朱正《鲁迅回忆录正误》、王得后《〈两地书〉研究》、孙玉石《〈野草〉研究》、张恩和《鲁迅旧诗

集解》,不仅成为作者本人的学术代表作,还成为20世纪80年代鲁迅研究乃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当之无愧的代表作。而上述著作在立场、思路和方法上的千姿百态,绝少雷同,彰显出第二代学人的鲜明个性。

仍以严家炎为例。在1982年发表的《历史的脚印,现实的启示——“五四”以来文学现代化问题断想》一文中,严家炎将中国现代文学的性质定位为“现代化”的文学:“我们的文学无疑应该现代化,也早就开始了现代化。如果说,历史决定了我国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的现代化只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才有条件提上日程的话,那么,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的中国文学,其现代化的起点却早了整整三十年:就是说,从五四时期起,我国就开始有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有了和世界各国取得共同的思想语言的新文学。”^②并进一步强调:“而鲁迅,就是这种从内容到形式都崭新的文学的奠基人,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开路先锋。”^③可见,严家炎的“文学现代化”论断,借助鲁迅提出,也借助鲁迅落到实处。据他回忆:“1981年,我在纪念鲁迅一百周年诞辰所写的《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一文中,试着提出一种新的角度和标准,就是‘文学现代化’……我从创作方法等方面对鲁迅的《呐喊》《彷徨》的特点做了较为细致的考察,着重阐明其现代的意义。”^④以鲁迅为支点构筑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体系,在第二代学人中形成了共识。对鲁迅的重视使第二代学人在体现共性的同时也保持并适时呈现个性,在个像与群像之间形成独特的张力。

三

不过,对严家炎等第二代学人优秀代表的

① 严家炎:《十卷〈全集〉,求实人生——严家炎先生访谈录》,《严家炎全集10 对话集》,第176-177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21。

②③ 严家炎:《历史的脚印,现实的启示——“五四”以来文学现代化问题断想》,《严家炎全集3 求实集》,第137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21。

④ 严家炎:《一个痴情者的学术回眸》,《严家炎全集7 问学集》,第13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21。

考察,揭示出的主要是研究者的个性与个像,对第二代学人个性与共性,以及个像与群像之间张力的呈现,则有赖于对一些看似普通的学人的研究。在这一层面上,由魏建、李宗刚等撰著的《蒋心焕志》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和方法。

《蒋心焕志》2024年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印行。该书既是一部教师和学人的传记,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传记;既是一部纪念文集,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纪念文集。由弟子和后辈编纂的学人传记或纪念文集,出于对前辈师长的礼敬之心,有时难免过誉,失之主观。情大于理,是其特质,也暴露不足,而且大多选择时代主流人物予以表彰,在凸显个像的同时,忽视对群像的有效呈现。《蒋心焕志》则独辟蹊径,有意淡化或主观或客观的描述,以丰富而精准的第一手史料支撑起传主的生命与人格。蒋心焕长期任教于山东师范大学,与第二代学人中的代表人物相比,著述不多。除参与撰写《中国现代小说史》(田仲济、孙昌熙主编,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①、独著《中国现代小说的历史沉思》(南海出版公司1993年版),主编《中国现代小说美学思想史论》(江苏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这三部学术专著外,其余多为教材、史料集或工具书,如《中国现代文学史》(田仲济、孙昌熙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山东文艺出版社1985年出版修订本)、《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与朱德发、陈振国合编,明天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与朱德发等合编,山东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新文艺大系(1937—1949)散文杂文集》(与田仲济合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年版),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简明词典》(任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等。平心而论,蒋心焕一生著述不多,算不上著作等身;作为地方院校的教师,知名度也不是十分突出。然而,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第二代学人的成就和特质,在他身上体现得至为明显。他虽然不是第二代学人的领军人物,但仍具备极为突出的代表性,体现在对教学的始终如一。对蒋心焕而言,注重教学甚于科研;在教学中,注重身教胜于言传。教师是他的职业,更是他一生的事业和志业。他是称职的学人,更是杰出的教师。在他心中,后者的分量显然更

重。蒋心焕先后求学于通州师范第一附属小学、南通师范学校和山东师范学院,与“师范”二字有着不解之缘。在山东师范大学任教四十余载,作为地方师范院校的教师,尤其是山东这样的教育大省的省属师范院校的教师,他一生教授的专科生、本科生、研究生、进修教师和各层次的学员数以万计,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传播和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他个人著作不多,却把自己毕生的精力投入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和人才培养之中,而且教学不是随随便便的照本宣科。蒋心焕和同时代的教师和学人一样,为了教学而自编讲义,为了一个作家、一篇作品、一种思潮,会把全部史料和文本梳理一遍,认真读原典、读原始报刊、读第一手的史料,花费大量的时间用于备课。事实上,他们为了教学而编写的各类讲义,比今天的许多学术著作扎实得多也厚重得多,但编写这些讲义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出版。以蒋心焕为代表的许许多多的第二代学人,从来没有想过凭借发表论文、出版著作实现所谓的安身立命,从中获得巨大的学术威望或丰厚的经济利益,而是把自家的研究心得和对现代文学学科的理想与情怀融入日常教学之中。这种理想和情怀却能在课堂内外触动、感染很多学生,使他们热爱并选择深入学习中国现代文学,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新生力量。众多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从业者,都是在求学阶段的课堂教学中受到教师学养与人格的感召,从而选择了这一学科。蒋心焕及其同时代学人的选择表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意义不仅在于学术研究,教学也承担着其使命和价值。高校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从业者,首要的身份是一名教师,通过教学实现学术的薪火相传。《蒋心焕志》通过一则史料、一篇篇文章展现出传主的睿智、儒雅和永在的温情,还有对教育事业的虔敬之心。

① 这是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部现代小说史著作,其突出特色在于体例。该书不以名家名著为核心设计章节,而是以中国现代小说中塑造的各类人物形象为主线。虽然在实际取得的学术成就上,该书与海内外学者夏志清、叶子铭、杨义的同名著作各擅胜场,但体例却独一无二。蒋心焕作为该书的四位作者之一,承担了诸多章节的撰写任务。

蒋心焕的选择,也和以山东师范大学为代表的地方师范院校在新中国成立后七十年来形成的学风密切相关。他曾在接受弟子李宗刚的采访时说:

我们学科的传承需要做到三点。第一点,我概括地说,就是重视资料的积累、建设,这是保证学科求真、求实、求深的一个研究基础。第二,我们的目的是培养人才,建设一个人才队伍,这样,学科才能不断地前进、不断地发展。事实上,我们就是如此。第三个问题,要团结,不能消耗。只有团结才能发挥我们的正能量,而我们这个团体永远都是朝气蓬勃、永远都是充满阳光的。^①

作为一所地方师范院校,山东师范大学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之所以能够在治学和育人方面均取得辉煌的成就,形成“山师学派”^②,正是源于蒋心焕提出的上述三点原因。《蒋心焕志》的副标题是《一个师范人及一代人的历史》,这是对传主心志的生动概括,也彰显该书作者之心志。相对于综合性大学,师范院校,尤其是地方师范院校,以培养和培训本地区中小学语文师资为目标,在教学中,注重基础知识,注重文本分析,相对而言不特别强调学术的前沿和理论的高深,教学在这类高校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将毕生的主要精力投入到不求回报的教学之中,为此不惜减少学术著述,这是包括蒋心焕在内的任教于师范院校的第二代学人共同的理念与选择。

值得关注的是,《蒋心焕志》除若干回忆性和评论性文章外,还收录了蒋心焕的人事档案(包括求学期间的成绩单和工作期间的各类申报表、审批表)、听课笔记、读书笔记、工作笔记、教案、论文手稿、日记、往来书信、年表、生活照片、著作书影、获奖证书,等等。借助这些第一手史料,事无巨细地记录着传主的一生,避免主观的评价,而强调客观的呈现。该书不仅呈现出蒋心焕一生求学、教学与治学的丰富经历,还借此呈现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第二代学人共同的命运与选择,既有个像的描绘,又有群像的展示。对

第二代学人而言,该书的价值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传记、纪念文集和学术论文,更像是为第二代学人量身打造的研究体例。选择并不十分知名却做出实质贡献的蒋心焕,也更能揭示第二代学人的普遍性。中国古代史书,尤其是作为正史的纪传体史书,以人物传记为主体,但以《史记》为肇始,借助《纪》《传》以外的《书》《表》(《汉书》开始出现《志》),记录丰富的史事之余,也和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构成鲜明的互文关系。作为史传文学体例之一种,《志》可以述史,可以纪事,但最终指向,仍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个体,仍在于人。《蒋心焕志》作为一部体例独特的学人志,一部生动可感的史料集,彰显的就是包括蒋心焕在内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第二代学人身上最可宝贵之人之精神。该书打破了一般意义上的传记和纪念文集的体例,以珍贵的第一手史料为基础,既是对蒋心焕最好也最适合的纪念,又体现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数十年来形成的“求真、求实、求深”的特色。这一写作方式与传主的精神世界是高度合一的。

笔者曾在一篇考察李何林先生的鲁迅研究的论文中这样评价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前辈学人:“任何一个行业或领域经过百余年的经营,总会产生若干位杰出人物,或开疆拓土,引领一代风潮,或承前启后,挽狂澜于既倒,都为其范式之确立、品格之奠定做出了可以载入史册的杰出贡献。”^③包括蒋心焕在内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第二代学人,其贡献和价值也是如此。时至今日,他们的学术成果可能不再被提及,被引用;若干年后,他们创建的学术范式可能会过时,会被取代,但他们对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坚守和传承,却永载史册。他们的止步之

① 蒋心焕:《蒋心焕回忆山师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发展历程(口述)》,魏建、李宗刚等著:《蒋心焕志——一个师范人及一代人的历史》,第236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24。

② 魏建:《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研究与学派传承——以“山师学派”为例》,《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③ 鲍国华:《作为方法和范式的注解——李何林〈鲁迅〈野草〉注解〉片论》,《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

处,恰恰成为后世学人的起步之处。他们不是封闭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而是打开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整理国故与中国现代俗文学研究的兴起”(19AZW021)阶段性成果。】

(上接第 42 页)更在更多的第三世界国家(譬如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因此,底层绝非一个“他者”的、遥远的苦难样本,正如鲁迅所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①底层劳动者的生存困境恰恰是世界运行逻辑、社会结构乃至文明隐疾最为集中和真实的显现,底层诗人们的生存困境书写正如一面被擦得雪亮的时代之镜,照见了城乡裂变中底层劳动者肉身与精神的双重漂泊,照见了高速发展的工业化进程中被忽略的生命代价,照见了全球化经济模式下流水线工人的异化劳动,也照见了我们所有人共同面临的关于尊严、公平与正义的普遍性难题。因此,对底层诗人新诗中“在场性”生存困境书写的研究,其意义不仅在于文学本身的拓展,更在于邀请我们所有人以一种共情的姿态,去看见、理解、反思并最终尝试改善他们的困境,或许这才是 21 世纪中

【作者简介】鲍国华,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代表作有《文学史家鲁迅——史料与阐释》《〈中国小说史略〉校注》《现代中国小说史学的兴起——以鲁迅、胡适为中心》等。曾获天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二、三等奖,商务印书馆“中华现代学术名著杯”学术论文大赛一等奖等。

国底层诗人的“在场主义”诗学实践最根本的力量与最终的归宿。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新诗的现实关怀与文体变迁研究”(22JJD75002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徐晶莹,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新诗、比较诗学、中国当代文学思潮。

^① 鲁迅:《鲁迅全集》第六卷,第 624 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